

踏步集

■ 祝伟坡 著

谈反错误倾向斗争问题

北洋军阀各派统治的更替

中国革命史人物评价问题

蒋介石由“剿共”到联共抗日的转变

《神曲》的基本思想到底是什么



山东大学出版社

踏 步 集

祝伟坡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踏步集/祝伟坡著. —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7. 6

ISBN 978-7-5607-3370-8

I. 踏...

II. 祝...

III. 历史—教学研究—高等学校—文集

IV. K-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72115 号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 250100)

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旅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1/32 6.75 印张 166 千字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5.00 元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愚人”立言

——《踏步集》序一

一

当年,伟坡在讲授“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课的过程中,曾对“反倾向斗争”和“第二次国共合作”作过专题研究,并把自己的研究心得撰写了两组文章。其中对“第二次国共合作”问题的研究尤具特色。过去很长时间,大陆学术界在论述这个问题时,绝大多数都是侧重于共产党为什么与国民党实行第二次合作,而没有从国民党的角度研究这个问题,对国民党方面为什么与共产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尚缺少实事求是的分析。——这当然是有其历史合理性的,因为研究者和写作者都是站在共产党一方,站在这样一个“叙事主体”的立场。但历史研究毕竟不等同于政策宣传,对于历史研究而言,全面、客观是很重要的。显然,在“第二次国共合作”问题上,后者的研究角度是一个很重要的角度,也是真正的历史研究者应该必须考虑的角度。伟坡先后撰写了《国民党为何与共产党实行第二次合作》等三篇文章,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细致独到的剖析。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的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我们一直把蒋介石作为反面人物来评价,说他是十恶不赦的“人民公敌”,彻头

彻尾的坏蛋，而没有把他作为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历史人物之一，对他的其他方面作出研究分析。本书作者根据当时公布的有关材料，较早就独立地提出，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思想是国民党与共产党第二次合作的重要思想基础。这在当时不仅需要卓识，而且需要勇气。

近读杨天石同志的《蒋介石的另一面》，进一步印证了伟坡同志的观点。杨天石同志是研究近现代史的权威学者，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就在中国大陆和台湾读过蒋介石日记的部分抄本和摘抄本。去年3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开放蒋介石的部分日记，杨是前往进行阅读的两名中国专家之一。据蒋的日记披露，在抗日战争期间，曾有人劝他利用“汪逆伪组织”跟日本谈和。对此蒋很反感，说，谁要再提此事，将“以汉奸论罪，杀无赦”。我们知道，英、美一直是支持蒋介石的，一定以为，蒋与英、美的关系亲密而牢固。其实，蒋对英国、美国是有许多看法的。比如，他骂英国是“老牌帝国主义”。二战末期，苏、美、英三国背着中国，签订一个《雅尔塔协定》。这个“协定”规定，要把原来沙皇俄国在我国东北所取得的权益，完全转移给苏联。美国为了减少牺牲，让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就同意了斯大林的要求。蒋在日记里就骂罗斯福：“卖华”、“侮华”、“畏强欺弱，以我中国为牺牲品之政策，实为其一生难涤之污点”。杨天石同志认为，蒋是坚持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但他主张用温和办法，要慢慢跟外国谈判，慢慢等待。所以说蒋是一个温和的民族主义者。上述第一手材料的公开，为全面评价蒋介石奠定了基础。真实是历史的灵魂，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给人以智慧。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关资料还比较缺乏的情况下，本书作者能够对蒋介石作出上述评价，这反映了他的学术视野和学术功力，是难能可贵的。

收在这本集子中的还有一篇文章，也有一个故事。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伟坡刚到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时，分配在外国文学教研

组。在此期间,他在较系统阅读西方文学名著的同时,想以“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但丁为突破口,深入外国文学研究的堂奥。而在当时,文学研究领域存在着一种倾向,就是强调人物的阶级性,否定普遍的人性。这种形而上学的方法几乎成为人们的一种思维定式。究竟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性是人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的统一的观点?伟坡从六十年代初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并写出了《〈神曲〉的基本思想到底是什么?》的初稿,中经“文革”十年浩劫,作者以为此稿早已成劫灰,没想到,到八十年代初,伟坡偶然发现了当年的手稿,他欣喜之余,又重新研究有关材料,将此稿作了补充,又请陈慧同志帮助修改后发表。这时距离当年初写此稿已有二十年了。此文遵循“人的社会属性由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人的各种社会关系总和所决定”的原则,具体地分析了作品的复杂内容:诗人对教会、教皇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但作品中又充满了基督教神学思想,尤其是禁欲主义就像一层浓雾笼罩着全诗。两种绝然对立的思想却统一在一个人身上,这种矛盾的世界观是新旧交替时代矛盾的社会生活在诗人头脑中的反映。正由于《神曲》表现了中世纪后期意大利社会新旧两种思想激烈斗争的状况,它才成为由中世纪到文艺复兴过渡的桥梁。这些深刻的论述就是在今天——距离此文发表又有二十年的今天,对于我们认识文学史的复杂现象,研究复杂的作家,不是仍有启迪吗?而此文时隔二十年才发表的传奇故事,不也是近几十年中国学术界复杂、艰难历程的一个折射吗?

二

伟坡的社会角色是一个大学教师,作为一个师范大学的教师,主要工作当然是教学。伟坡对教育工作的忠诚集中地表现在对教学工作的刻苦钻研上。同时,他在备课、教学之余,始终没有放松科研工作。这本《踏步集》中的文字就是他过去科研成果的一部

分。尽管书中所收文章数量有限,仍可从中窥见他的治学态度和学术水平。由于他在教学工作中,一贯认真负责,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因此教学效果良好。仅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担任“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主任期间为例:1988年获校级教书育人奖;1991~1992年,在河北师范大学党校进行了四次专题讲座,受到普遍好评;九十年代前期,中国革命史课被评为校级优秀课程。更值得称道的是,他在教书育人过程中,坚持辩证法,抵制形而上学。他曾不止一次与我讲到这样一些观点:一个人的思想认识水平总是在实践中逐步提高的,全知全能的人在世界上并不存在。1872年马、恩在给《共产党宣言》所写的序言中就指出:“由于最近二十五年来大工业已有很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个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过时了。”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推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国内形势稳定后没有及时调整,引起工人农民的普遍反对。列宁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样的伟人都曾有“过时”的认识和失误,怎能要求青年学生不产生这样那样的不正确的思想呢?这与我们长期以来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有直接关系。

比如,在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时,我们曾把林彪1929年给毛泽东写信,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作为一条罪状加以批判。林彪晚年叛党外逃,历史已有结论。但他给毛泽东写信这件事并不错,伟坡和我谈过,他认为林作为一个下属的干部,用这种方式向党的领导去反映自己的认识,提出自己的意见,应视为正当行为,不仅不应受到批判,还应得到肯定。从客观事实上看,也正是因为林彪写了这封信,毛泽东才写了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澄清了一部分干部、群众的模糊认识,推动了当时的革命斗争。后来,林彪为了掩饰这段他认为不光彩的历史,在他所写

的《重上井冈山》词中，特意标榜自己：“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这种辩白与对他的批判，似乎正好相反，其实在思想方法上都是形而上学。当然，伟坡上面的谈话，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不可能公开讲述的，今天看来也许也并不新颖，但在当时却不是每个人都能说出来的。

在大学教好书，需要许多方面的准备。除了教学者本身的素质，比如条理清晰的表达，美观扼要的板书，教学时课堂节奏的把握等等，还需要对教材的深入研究，需要及时掌握本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并且还要融入到自己的日常教学中，提出自己的一定见解，而不是照本宣科，这样才能促使、刺激听讲者的思考。这是促使伟坡进行研究的一个主要的、现实的动因。这些说来容易，真正做到却很难。而对研究中共党史的人来说，在石家庄这样的城市能做出一点成果来，就更是不易。首先是客观的制约，中国长期以来，就是一个各方面资源分配极度不均衡的社会，不仅是经济资源，而且是文化资源。想想看，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还有其他一些中央研究机构常备的一些资料，在地方院校都是找不到的。这些客观的条件，也的确制约了地方研究机构的研究水平。但是，另一方面，在同样的客观条件下，不同的人却做出了很不相同的成绩，这就值得思考了。

伟坡常年自费订阅《中共党史研究》、《党史通讯》、《文献和研究》等学术期刊，《光明日报》他也是自费订阅多年。从这些报刊，他获取了比周围的人较多的学术信息和学术思想。更重要的是，在学术上，他有一种求知的热情、一种求真的勇气和独立思考的品质，一种敢于质疑、善于提出问题的学术素质。与黎澍讨论“历史创造者”一事，就很能说明他的这种精神。伟坡素有中国传统士人平等讨论的传统，对黎澍这样的著名的学术权威，他有自己的疑问，就平等地提出来讨论，这就是他的风格。当然，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他具有和全国顶尖学者对话的一定能力。

三

伟坡 1935 年生于冀南魏县的一个书香门第,到他父亲时家已败落。他年幼丧父,家境贫寒。但由于家族有男儿读书的传统,就是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他的母亲仍把他送进村里的私塾。在私塾里,伟坡学的是《论语》、《孟子》等旧学读本。孔、孟倡导的仁、义、礼、智、信,以及“吾日三省吾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传统观念和行为规范,在他心灵里扎下了根。1947 年,家乡解放,他正式上了小学,后来又考取本县师范学校。毕业后,先在一个完小当教师,半年后调县干部业余学校任教。在工作中,他刻苦学习知识,并有意识地把优秀文化传统与新的革命思想结合起来,思想和业务水平不断提高。1956 年 9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考入河北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1958 年院系调整,与河北北京师院中文系合并。在大学期间,他一直担任学生干部,先是班主席,后任党小组长。作为学生干部,对于同学们在学习与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他总是主动帮助解决,受到大家的普遍拥护。1960 年暑期毕业,他到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1962 年暑假后,做专职学生工作。“文革”开始后停课“闹革命”,他自然也在劫难逃。1970 年冬,招收工农兵学员,他先做班主任,兼授政治课;后又调学校马列主义教研室,先后从事“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教学工作。

伟坡在高校工作几十年,工作调换了多次。但不论在哪个工作岗位上,也不论时间长短,他都尽职尽责,用扎扎实实的工作,来为社会添砖加瓦。在做政治辅导员和班主任时,能与同学们平等地交流思想,同学们愿意向他吐露心声;在教学工作中,他自觉地把教书与育人结合起来,使同学们在获得知识的同时,思想得到提高。他就是这样,不挑工作,不讲价钱,放在哪里就在哪里发光发热。这不仅是一种善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境界。也许有人会

说,这是缺乏主体精神,是“驯服工具”。不错,但我们看问题,不能脱离社会历史环境。其实,不论在哪个历史发展阶段,都需要有不计个人得失、埋头苦干的人。正是这样的千千万万的“愚人”在推动着历史前进。如果满世界都是“聪明人”,那社会将是个什么样子呢?

古人说过:“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衰,此谓不朽。”纵观历史,真正能做到“三立”、“三不朽”的可以说凤毛麟角,我等芸芸众生,虽不能至,却心向往之,而且,这并不妨碍人们把它作为奋斗目标,更何况德、功、言也是有层次的。而从另一方面讲,作为教师、作为一名历史研究者,其“立德”、“立功”,最后都应体现、落实到他的“立言”上面。本书作者就是这样一位“慎独以修身,推诚以事教”,在学校工作了四十多年的耕耘者。与闻人政要、各类影视明星相比,他是一个平凡的人,并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但却是严肃对待生活,自觉地把命运与社会联系起来。正因为如此,他的人生经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演进。此集“愚人”之言,可为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生做个见证,也为后人留下一点史料,而本书的价值并不止于此,它的学术价值本身,就足以使它为后人所记、所用了。

我和伟坡相交半个世纪,手足情深。我们都能坦然面对自己的平凡,也为珍惜过每一个清晨和黄昏而感到欣慰。不是吗,只要奋斗过,追求过,这就足够了。伟坡虽年逾古稀,但仍不断学习、进取。我一直想有机会为老友写点东西,趁他的论文集《踏步集》即将付梓之际,拉拉杂杂地写了上面这些话,是为序。

白玉民

初稿,2007年1月于石家庄寓所,3月初改定

二十年一纸文字缘

——《踏步集》序二

我和祝伟坡先生的结缘堪称是一场奇遇，不由得让人慨叹“这个世界真是太小了”！还是让我索性从头讲起吧——这个“头”当然就是已经故去快二十年的黎澍先生。没有他发起的“历史创造者问题讨论”，就不会有我和祝先生的相识。

黎澍先生在1984年第5期《历史研究》杂志上刊发了一篇惊世骇俗的论文：《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说这篇论文惊世骇俗，是指此文直捣我们传统意识形态的老巢，而当时的整个社会仍处在这个意识形态的笼罩之下。黎澍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提法与“英雄史观”一样，也“没有脱离唯心主义的窠臼”，同样“完全错误”。这对于信奉“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动力”的绝大多数人而言，怎能接受呢？此文本身的份量加上当时特定的舆论氛围，使得当时的理论界一下子像炸了锅。不过，人们的反应还要有一段时间才能表现出来。根据我掌握的材料，1985年的整个学界似乎并无反响，转机从1986年开始。1986年初，黎澍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系列论文第二篇《历史的创造者和创造历史的动力》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丛刊1986年第1期上推出，此文的副题是“答祝伟坡同志”。黎澍在此文的导语中说：“《论历史的

创造及其他》一文发表以后,收到过一些同志的来电和来信,都转交给了《历史研究》杂志编辑部,请他们研究处理。另有河北师范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祝伟坡同志在信中指出,与历史的创造问题有关系的两个问题‘还不清楚’,要求答复。这两个问题是:‘一、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二、林彪说,历史是由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的(大意)。对这两种观点,应当怎样认识才是正确的?’上引来信提出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从另一个问题出发的,这就是:历史的创造问题是可以讨论的吗?”祝伟坡的信一下子把黎澍直接置于毛泽东的论断之前,使他再无闪避的余地,于是引出了他的滔滔宏论,他对自己观点的陈述和论证更深入了,也更具有了针锋相对的性质。历史创造者问题讨论的高潮由此到来。高潮期间,《光明日报》辟专版提供阵地,《历史研究》、《文汇报》等著名报刊均参与其中,《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均关注过这场讨论。这场讨论一波三折,最后终结于1989年那场风波。综观这一论战的全过程,坦率地说,尽管不乏有力的支持者,但黎澍的观点并不占上风。究其原因,我想,“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两个命题,本质上是意识形态命题,不是学术命题,所以,在学术的层面上永远也无法解决,现在看来,黎澍及其追随者当年在学术上太较真了。由于这两个命题是两个意识形态论断,不是愈辨愈明的是非,这场讨论后来屡遭扼杀,也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历史创造者问题讨论从发起到走向高潮期间,我正在读史学理论专业的研究生,这一讨论自然为我所关注,再加上我特别推崇、欣赏黎澍关于思想解放的一系列言论,所以,黎澍答祝伟坡的这封公开信式的论文发表之后我就读过了,“祝伟坡”这三个字也就从那时开始印入我的脑子里了。后来,因撰写学位论文的需要,我曾赴京拜访过黎先生。毕业留校后,我所从事的第一项学术活动就是参加了当时还处在白热化状态的历史创造者问题论战,这

就是《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一文在《文史哲》1988年第1期上的发表。如果说,祝伟坡先生当时是以主流意识形态为背景向黎先生的见解提出了问题的话,我则是以比黎先生走得更远的角度向黎先生发出了质疑:在肯定黎澍实现了“当代中国史学理论发展史上的第三次重大突破”的同时,我也明确提出黎澍的论点尤其是基础论点“是很不彻底的”,存在着很大的“缺陷”,甚至扬言要“在黎澍终止思维的地方继续前进”,以“彻底解决历史创造者问题”。黎先生一方面对我的一些看法表示赞赏,一方面也为自己作了辩护,这就是他的五篇系列论文的最后一篇,题为《把马克思主义从庸俗化的教条束缚下解放出来——答王学典》。因是回应文章,此文也刊发在《文史哲》上,时为1988年5月底。

因否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两个命题,黎澍招致了许多公开的批评、商榷乃至上纲上线的批判,但他所作的正面答复很少,所能看到的就是答祝伟坡和我的两篇。但“祝伟坡”其人是谁,对我来说一直是个谜,甚至感到很神秘,曾多方打听,没有结果,这益发增加了我的好奇心。2002年初,我奉命在山东大学组建文史哲研究院。建院之后搞的第一个学术活动,是开了个规模很小但层次很高的学术研讨会。为此,我请当时在《历史研究》编辑部工作的仲伟民兄代邀《中华读书报》的编辑参加,于是他把祝晓风兄推荐与会。我和祝兄一见如故,此后交往频繁。一次闲聊时,因知他是河北人,就问是否知道“祝伟坡”这个人,他听后笑了,说当然知道了,他是我父亲。我当时真的是目瞪口呆,半晌才反应过来。我总算了却了一桩疑问。后来在晓风府上,他又让我翻看了伟坡先生大学四年的四本日记,读这些幸存下来的日记,真令人如同进入时间隧道一样,重新经历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特殊的大学校园生活,那种处处充斥着“政治”的大学生活,是现在的学生们永远也无法理解和想象的。当我合上那已泛黄的日记本时,我由衷地敬佩伟坡先生,敬佩他的勤奋和细

心,并建议晓风将这些日记尽快整理出版,以供研究者使用。再后来,伟坡先生来山东游历,我们一块谈黎澍,谈那场我们都涉身其中的讨论,彼此倍感愉快。通过这种直接接触,我才知道伟坡先生写出那封让黎先生不得不答复的有深度的信实非偶然。勤学敏思,知识丰富,关心国事,是伟坡先生最大的特点,我为自己认识了一位富有智慧的长者而深自庆幸。我想,我也从这里找到了晓风兄之所以能写出那批震动学林的檄文的部分原因。

现在,伟坡先生将他一生的部分成果汇编成册,以作纪念。在交付出版前,他坚邀我写上几句话,我为此惶恐了好长时间,不敢答应,最后想到,可以借这个机会交代一下我们通过黎澍先生而相互认识的机缘,以给拨乱反正时期的思想史研究提供一个掌故,我这才答应下来,援笔写了上面的话,勉以为序吧。

王学典
丁亥初春

目 录

“愚人”立言——《踏步集》序一·····	白玉民(1)
二十年一纸文字缘——《踏步集》序二·····	王学典(1)

中国革命史人物评价问题·····	(1)
北洋军阀各派统治的更替(1912~1928年)·····	(9)
《神曲》的基本思想到底是什么?·····	(31)

谈反错误倾向斗争问题·····	(42)
清“左”的影响 挖“左”的根源·····	(53)

李大钊对革命统一战线的重大贡献

——纪念李大钊诞辰九十五周年·····	(62)
蒋介石由“剿共”不抗日到联共抗日的转变·····	(78)
国民党为何与共产党实行第二次合作?·····	(92)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特点和意义·····	(101)
我国民主党派的参政地位及其作用·····	(110)

《论持久战》的理论光辉照亮了抗日战争胜利的道路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120)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133)
《金星人民公社史》的流产与人民公社的解体	
——编写公社史的回忆和思考·····	(137)
五十年沧桑一卷书	
——《青苔集》序·····	(177)
附 录·····	(185)
关于附录黎澍文章的说明·····	(185)
历史的创造者和创造历史的动力	
——答河北师范大学祝伟坡同志·····	黎澍(187)
“原地不动,就是进步”——编后记 ·····	(193)

中国革命史人物评价问题

为了更好地评价中国革命史人物的功过是非,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教训,现仅就以下问题略谈浅见。

评价中国革命史人物的重要意义

正确评价中国革命史人物,具有重要的历史认识价值。中国革命史上的人物,是在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正确评价这些人物,可以具体了解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历程,加深对近现代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史发展规律的认识。

不同的历史条件产生不同的历史人物。要正确评价革命史人物,首先要弄清当时的社会背景、时代风貌与有关的历史事实。如慈禧太后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个突出的反面典型人物。她对内残酷剥削镇压人民,对外妥协、投降、卖国,完全成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在慈禧身上集中反映了当时深刻尖锐的社会矛盾和清王朝的反动腐朽性,这就预示着革命风暴的到来和清王朝的覆灭都是不可避免的。

正确评价中国革命史人物,可以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历史经验是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和广大群众的实践总结、智慧结晶,是对